

从《理智之年》看“自由之路”上的身份焦虑^①

江锦年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萨特在小说《理智之年》中展现了个人要实现自由所面临的身份焦虑, 并揭示了焦虑的根源所在, 表明了他在二战后对自由的新理解, 即强调“行动”在“自由之路”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理智之年》; 自由; 身份; 时间; 共在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3-0077-03

The Identity Anxiety on “the Road to Freedom” Shown in “L’ :Age De Raison”

JIANG Jinnian

(College of Liber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vel “L’ :Age De Raison”, Sartre displays the identity anxiety which individuals face to achieve freedom and reveals the source of the anxiety, which shows his new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after the World War II o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action” on “the road to freedom”.

Key words: L’ :Age De Raison; freedom; identity; time; Mitsein

自由问题是让·保尔·萨特整体思想的核心, 也是萨特文学作品的主题。《理智之年》是萨特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四部曲的第一部, 开始写作于1939年, 出版于1945年。在此期间, 萨特出版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1943年), 更为重要的是他亲历了二战, 战争使萨特对自由有了新的认识。因此, 《理智之年》不仅可以和《存在与虚无》进行互文性解读, 而且对了解萨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萨特认为:“每幅画、每本书都是对存在的整体的一种挽回, 它们把这一整体提供给观众的自由”。^[1]^[130]然而, 存在的真实状况是哲学难以描述的, 文学却能加以形象的表达。笔者试图以萨特的哲学著作为参照, 对小说《理智之年》进行文本细读, 探析个人要实现自由所面临的身份焦虑及其焦虑的根源所在, 思考人如何在伴随人的整个处境中实现自由。

—

《理智之年》中主人公马跌作为一个恪守自由信条的人, 努力用自己所选择的人生之路来证明自己的自由, 然而他却在“自由之路”上深陷于身份焦

虑。小说一开始叙述马跌的情人玛尔塞拉怀孕了, 马跌面临着身份选择的困扰:是继续做玛尔塞拉的情人, 还是成为丈夫和父亲。马跌不愿受到婚姻和家庭的束缚, 他选择让玛尔塞拉打胎, 又没足够的钱, 后续故事就围绕“借钱打胎”这一线索展开。表面上看, 玛尔塞拉怀孕这一突发事件打破了马跌看似平静的生活, 但通过文本细读, 我们注意到, 即使没有怀孕事件, 马跌也始终沉浸在身份焦虑中。在马跌眼里, 他自己不是一个哲学教员; 不是雅克的弟弟; 不是玛尔塞拉的情人; 不是达尼尔和布律埃的朋友……^[2]^[79]总之, “我是谁?”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跌。

“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3]^[87]在萨特看来, 人即为“自为的存在”, 是向着既成自我之外的超越, 不可能像“自在的存在”那样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于是, “身份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人们的身份焦虑意识。”^[4]^[129]那么? 这种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的根源是什么呢?

这一问实际上道出了马跌的内心感受, 马跌觉得她应该“惋惜”。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时间性的根源, 指出“这个把人的实在与自身分离开

① 收稿日期: 2010-04-12

作者简介: 江锦年(1978-), 女, 湖北宜都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的虚无就是时间的起源。”^{[5]141}这张照片把此时和时间合一的玛尔塞拉从时间中分离出来了,让马跌看见了时间对她的销蚀,马跌怜悯她,觉得她的一生挺可悲的。他询问玛尔塞拉自己是否老了?他在面对少女伊维琦时为自己的“老”而自卑。

的确,时间的流逝意味着有无穷尽的可能,只有“死亡将生命改变命运”。^{[5]156}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死,就不可能成为一种自在,而是在不断的流变之中,即使你不希望,时间也会“迫使”你改变身份。正如照片上的玛尔塞拉还是化学系的学生,“可能就是为了成为自我而欠缺的东西。”^{[5]142}这样看来,人无法摆脱的自我身份确认的焦虑源于人的“被抛”——时间流逝所包蕴的无数“可能”。既然这样,这种无法摆脱的焦虑可以视为其“生存意识”的体现,除了焦虑,人能做什么呢?自由就意味着反抗,《理智之年》中萨特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抗击焦虑的方式。

第一种,采取等待的姿势。代表人物是马跌。马跌认为,人的一辈子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未来组成的,就好比天体是由空虚组成一样。他时刻想着开始新生命的行动。然而,他总感到缺少这种行动的理由,每次在爆发性的决裂的边缘上,他就会阻止自己行动。马跌一味地等待,等到故事结束时,他只能绝望地宣称自己已经结束了青春,到了“理智之年”。

第二种,化解焦虑,顺从地接受所有的人生际遇。代表人物是雅克。他认识到自己已经到了“理智之年”,于是认同了一个和自己年龄相符合的身份,并按照与这一身份相符的生活原则泰然自若地生活。显然,他摆脱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然而,当一个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事先以自己设定的身份来行为处事,这看起来是从容理智的表现,实际上却陷入了“逃避自由”的自欺状态。

第三种,转变焦虑的内容。代表人物是劳拉。这个四十多岁的歌唱演员,害怕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她深爱二十岁的小伙子波里。这种迷恋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她留恋逝去的青春的“转嫁”。这样一来,她似乎不再是一个人面对衰老了,她只要牢牢地控制波里的爱就可以了,这显然也是一种自欺。

第四种,不断的选择并付诸行动。代表人物是布律埃。这个共产党人体验到了焦虑,但是他没有被焦虑束缚和压垮,他选择了行动。萨特借马跌的口赞扬他,“他的一生是负有使命的。他的年龄、他的阶级、他的时光、他什么也抓住了,什么都承受了……他又得到了一切,乃至他的自由……”^{[2]87}

尽管萨特主张作家必须向作品“客观性开放”,

但他对待这几种反抗方式的态度却是很明显的。同时,他也借布律埃对马跌的提问进行询问:是什么在阻止你?难道你能想象你自己可以在括弧里虚度一生吗?究竟是什么阻止了马跌的行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一段对话找到答案。在马跌和伊维琦看过高更的画展之后,伊维琪将高更和马跌进行了对比,她评价高更是一个“绝望”的人,正是这种“绝望”促使高更义无反顾放弃做个政府机关的小职员,去了塔希提岛。伊维琪断定马跌不会绝望地离开,因为“你有职有业,有居有室,世界上再有金子你也不会换的。”^{[2]110}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中将“绝望”称为“致死的疾病”,并指出绝望导致两种主要行为:绝望地不成为自己或绝望地成为自己。由此,我们看到了萨特对自由思考:在不能左右的时间的流逝中,人应当“绝望”,不能等待时间的流逝来揭示自己应该是谁?要在行动中塑造自己,没有行动就没有人的实在。

二

“除非通过另一个人的介入,我是无法获得关于自己的任何真情实况的。”^{[6]12}也就说,一个人在“自由之路”上必须依托于外在关系得到自己的意义,使自己具有一个“身份”。萨特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分析得出:人与人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这必然加重了自我在“自由之路”上的身份焦虑。纵观整部小说,马跌的身份焦虑还与他和玛尔塞拉双边关系的破裂,“共在”的解体相关。

“我们——共在”关系是萨特“他人就是地狱”的人人关系中的一抹亮色,萨特指出罗马人以“城邦的白酒”来描述这种关系。“在主体‘我们’中,个人不是对象。我们包含互相承认为主观性的众多的主观性”。^{[5]505}马跌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玛尔塞拉视为他的清醒、伴侣、凭证、顾问还有法官,将他和玛尔塞拉的双边关系视为“我们”,以此将作为对象的“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性弱化,使得双方获得与我的一致性。这种共在关系对马跌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当他决定让玛尔塞拉打胎时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一点在他向雅克借钱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雅克指责马跌将玛尔塞拉控制在一个受屈辱的地位;马跌说“玛尔塞拉完全同意我对于结婚一事的意见。”^{[2]159}在这里,萨特描述马跌说话时口气高傲。马跌偶尔也想:如果玛尔塞拉要这个孩子该怎么办?但基于“我们”的“共在”,马跌打消了这个念头,减轻了在此事件上的愧疚心。

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多次出现在马跌的头脑里:贝壳。马跌认为自己随时都带着他的贝壳;他把进入玛尔塞拉的房间比作走进一只“贝

壳”；当他为无法拥有伊维琪而感到无限失落时，想到伊维琪永远也不会钻进他的“贝壳”里。从这个意象我们可以揣测，马跌试图将自我和他者“囚禁”在一起，或者说希望“我们”固定。然而，“我们——共在”关系其实并不稳定，是很容易解体的。“我们只在别人眼中是我们，并且正是从别人的注视出发，我们才把我们作为我们承担起来。”^{[5]516}当达尼尔和玛尔塞拉瞒着马跌幽会时，他俩相对于马跌就构成了“我们”。这样，原属于共在关系的马跌与玛尔塞拉就又互相对象化了。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我们——共在”关系时谈及，“人的实在无法摆脱这两难处境：或超越别人或被别人所超越。意识间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在’，而是冲突。”^{[5]524}马跌与玛尔塞拉认识了十年，七年来他每周有四次到她那儿过夜，现在玛尔塞拉又有了他的孩子。应该说玛尔塞拉也尽到了一个妻子的义务，现在也有了做母亲的条件，但是她要获得妻子和母亲的合法的主体地位，需要马跌娶她，而这却违背了马跌的自由信条。马跌面临着情人、丈夫和父亲的选择，但这个选择最终的决定权不只是他一个人，这必然涉及到玛尔塞拉。而且，从整部小说分析，马跌与玛尔塞拉之间共在关系的解体却是必然的：马跌每次需要洞察一下玛尔塞拉的感情时，都会被一种不可制胜的懒惰所攫取。而玛尔塞拉并不甘心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被马跌的意志所控制。她认为，她和马跌的共在关系其实对马跌更有利，她和达尼尔约会并非情欲使然，更多的是对这种共在关系的反抗。她觉得，只有瞒着马跌的事儿才是属于她自己的。这论证了亲密的“我们——共在”关系是次级的，它不是意识间的本质。小说中劳拉和波里的共在关系也一样，劳拉对年华已去，一事无成的现实感到焦虑，害怕一个人承担未来。她几乎疯狂的迷恋波里，她认为只要波里在她身边，一切都有希望。但在下一刻，波里明确地告诉劳拉“我可太年轻了，我管不了你孤独。”^{[2]59}

由此可见，人不仅要绝望，还要孤独。“从现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减轻这重量。”^{[5]710}那么“孤独”就可以自由吗？马跌在失去了玛尔塞拉以后悟出“一个人，但并不比以前更自由。”^{[2]443}这又再度表明了“行动”的重要，因为人人关系是因为行动而变化的。与马跌相比，达尼尔的行动更为积极。达尼尔的同性恋身份是天生的，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恨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试图改变自己，选择和玛尔塞拉结婚。对玛尔塞拉来说，她也需要成为一个母亲来改变一事无成的现状。他们的婚姻，以“恨自己”为

前提，救赎为目的，新生为展望。达尼尔把这个看似荒谬的决定告诉马跌，马跌想：“就是这吗？自由？他行动了……在他身后有那么一个未知数的行动，这许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并且马上就要搅乱他一生了。”^{[2]441}而马跌自己呢？长久的等待，一味的拒绝和否定有必然结果的行动，让他最终明白：他这一辈子注定要没有意义，他什么也不是……

“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6]16}时间无情地流逝，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这溢出浓郁悲观气息的世界让人感到绝望和孤独，让人在“自由之路”上找不到任何的立足点，面临着身份焦虑。

马跌宣称“我只想像我自己。”^{[2]26}萨特对他自己也做过类似的评价，他说：“一切都来自我自己”，“我是一个顺从的孩子，我顺从到死，但我只顺从自己。”^{[7]118}然而，马跌却在“自由之路”上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只能背着他的“贝壳”，自嘲到了“理智之年”，“我只想像我自己。”——这句话最终只能是空洞而虚华的誓言。萨特如此刻画马跌，反映二战后的萨特更加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行动是人唯一的希望，人只有介入到某种行动中去，才可能获得最大化自由，使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人。这也使萨特的后期思想比《存在与虚无》时代的“绝望”和“孤独”更多了一份“希望”。

参考文献：

- [1] 萨特. 萨特文论选 [M]. 施康强,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30.
- [2] 萨特. 理智之年 [M]. 亚丁,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79, 19, 87, 160, 110, 159, 341 – 342, 56, 59, 443, 441, 26.
- [3] 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Z]. Edward Arnold, 1988:87.
- [4]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129.
- [5] 萨特. 存在与虚无 [M]. 陈宣良,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41, 156, 142, 505, 516, 524, 710.
- [6]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M]. 周煦良,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12, 16.
- [7] 萨特. 词语 [M]. 潘培庆,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118.

责任编辑:李珂